

# 语言转向和西方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深入发展\*

郭远兵

(武汉体育学院心理学系, 武汉 430079)

**摘要:**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自我批判的产物,对西方心理学摆脱“康德式难题”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内在逻辑为理论背景,分析了由此引发的西方心理学研究主题、线索和路径变迁。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是语言转向的三种方式,共同实现了20世纪的语言转向,影响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变迁,推动心理学关注语言建构和文本陈述,激发新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

**关键词:**西方心理学;语言转向;分析哲学;解释学;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0)01-0009-05

## 1 引言

哲学问题根本上是语言问题;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经历的第二次根本性变革。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致力于本体论,追问根本存在。笛卡尔以降,哲学的首要问题从“存在什么”转变成“何以知道”,追问认识的依据、能力和限度,称之“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将语言置于优先地位,重点不是考察认识的依据,而是追问知识表达的意义。语言转向,孕育于弗雷格建构数理逻辑对数的意义追问,萌芽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实现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和实在同构论断,完成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Klippel & Montello, 2007)。至于“语言转向”是否已成过去,尚存争议。

西方哲学从传统的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转向近代以语言问题为中心的语言哲学,是哲学摆脱内在危机的途径,对西方心理学摆脱“康德式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关切到心理学研究主题、线索和路径的选择(郭远兵,漆昌柱,郭小安,2013)。这种影响和关切是历时性和共时性并存。那么,西方心理学的“语言转向”究竟是指什么?笔者认为,心理学的“语言转向”是在反思和批判近代认识论所造成的学科危机话语背景下,包含西方心理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重视,更是指理论和研究中自觉地探讨和反思人性、实在和语言的关系。人性的意义不仅是被某种语言表达或者反映,更是被语言所创造。

然而,西方心理学长期以来存在“语言缺位”。有研究开始反思西方心理学语言缺位的表现和原

因,以及语言学转向的理论意义、渊源和整体表现(周宁,刘将,2007)。但是,鲜有详细探讨不同的语言转向方式及其对西方心理学理论和研究变迁所产生的影响。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企图克服近代认识论的认识模式,努力在语言基础上重建哲学大厦。在这一卓绝努力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转向语言方式:英美分析哲学、德国解释学和法国结构主义(邓安庆,1990)。本文拟具体探究不同语言转向方式的内在理路,据此探讨其对西方心理学研究主题的改变,研究重点的转移以及研究方法的转换所产生的影响。

## 2 分析语言和西方心理学科学进路的深入

分析哲学是一次与传统哲学的决裂,是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邓安庆,1990)。尽管在如何对待语言的问题上,分析哲学家存在理想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分歧,但是他们一致认识到传统认识论哲学的各种缺陷,把研究重点由主体生理—心理层面或纯粹的推理转向语言的精准和逻辑分析。源于内在的自我批判,分析哲学大体可分为二战前夕的逻辑实证主义阶段和二战后的语言分析阶段(主要是心灵哲学),其区别可概括为一个研究纲领和两种语言区别的信念:研究纲领试图为诸如语言、知识、意义和真理等寻找基础;两种区别,一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一个是描述语句和评价语句的区别(塞尔,崔树义,2001)。

分析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可以看到科学心理学律动的身影。概括而言,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类

\* 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9YJC890013),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资助(B2018218)。

通讯作者:郭远兵, E-mail: gyb0715@aliyun.com。

似心灵、意识和认识成为心理学和哲学共同探讨的问题。甚者,科学心理学为心理主义思潮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哲学逻辑被心理主义归结为经验的心理活动规律,是经验的综合。若不能战胜心理主义,哲学将会丢失最后一块阵地(江怡,2004)。为摆脱危机,弗雷格建立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系统,探讨指称和意义等基本范畴,研究客观知识的逻辑结构。沿着这个思路,早期分析哲学代表石里克,卡尔普纳等建立逻辑实证主义,揭示知识和感觉经验的关系,为第二代和第三代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做了哲学铺垫(叶浩生,2007)。

20 世纪 50 年代后,逻辑实证主义走向衰落。任何观察都受经验的影响,都有理论负荷,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客观知识是不可靠的(Hanson, 1960)。这与格式塔主义心理学的知觉理论不谋而合,也影响到新精神分析学派的演进,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也开启了 20 世纪 70 年代心理学界对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在 20 世纪最后的 30 年,分析哲学的兴趣从意义和指称问题转向了人类心灵问题。人作为语言使用者这一主体功能凸显,知觉、思维、信念和意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语言形式和语言使用者。语言的外在表现不再是重点,重点转向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过程。心理主义的价值重新被发现。

心理主义的回归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现代认知科学,他们为心理和逻辑的融合创造了条件(Pelletier, Elio, & Hanson, 2008)。同时,心灵哲学承接传统哲学的身心关系等问题,在认知神经科学所积累的成果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心理归因、感知与行为、语言思维等认知问题,为认知心理学研究认知内部机制提供哲学依据。另外,心灵哲学继续思考身心二元问题,并提出不同的解答思路,如类型统一论、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因果作用同一论、伴随性物理主义、构成性物理主义、常识心理学、反个体论和模拟论(江怡,2004)。其中,类型同一论和功能主义影响最甚,二者是信息加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发展的科技哲学基础。

分析哲学澄清了哲学语言,把康德对知识能力的先验批判变成了对形而上学语言的批判,防止由语言误用而产生的虚假问题,目的是加强语言的逻辑功能,确保概念的确定性。尽管如此,分析哲学还是忽略了语言中所凝结的社会历史意义和个人情感意志(邓安庆,1990)。分析哲学根深蒂固的文化追

求是不受时间限制和不可更正的真理。大半部西方心理学史亦以此为目标,但从未真正达成过。尚若分析哲学要保留实现其科学幻想和完整专业化梦想的话,那么他们自身就永远处于狭隘和不受时间限制的和陈腐的危机中。因为“我不相信存在任何叫做‘概念’和‘意义’的那种可以分析的天然金块”(罗蒂,陶黎铭,1989)。

### 3 解释语言和西方心理学人文进路的深入

解释学以另一种姿态转向语言,它不是用语言逻辑来填补传统认识论的留白,而是把目光投向神话、语言、宗教和艺术,以此追究人生意义。真理与语言相联系,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是解蔽和遮蔽的统一(海德格尔,2006)。诠释学中理解与文本的关系,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参与意义的形成。解释学转向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和推动了心理学的进步。但是,心理学的解释学转向不是改变传统的研究对象,而是改变研究策略和线路,即心理学不只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活动体系,是确定和发现人性意义的实践(叶浩生,2007)。接下来就该讨论如何获得理解。

首先,诠释学返回到希腊语源的词根分析法。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语言的意义分裂始于拉丁化时期,罗马思想并没有真实地接触过希腊词语,表面上真实可靠的翻译实则遮蔽了希腊语言的本真意义。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都试图把语言的本真意义从日常语言的遮蔽中解救出来。狄尔泰将该思想引入心理学,区分了解释心理学和理解心理学,促成心理学第三势力的生长。人的心理和行为被视为待解释的文本,需要通过理解和体验的方式来解释;需要重拾被忽略的社会-历史-文化维度。通过理解和体验,直观和生活地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和价值,这为研究人类高级和复杂的心理过程和状态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其次,诠释学回到存在的语言。既然日常语言研究的迷途是把语言当作工具,人文哲学家就要将语言视为工具转到将语言视为存在。语言不是随意地夸夸其谈,而是人“存在的家园”。语言和心灵最密切的关系表现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据此,西方心理学开始通过语言符号来理解人性,是语言说人,而非人说语言。人格心理学领域开展以词汇学假设探究人格;叙述社会心理学兴起了社会心理学的一种另类叙述,修辞和叙述直接成为研究对象(郭远

兵,孙时进,2017);另外,存在意义上的语言理论助力了西方心理学人文主义转向、复兴文化心理学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

再次,诠释学提出存在的语义生成论。所谓语义生成,就是指语言意义不是独立和固定的,而是正在发生且没有终结的动态过程。该动态过程既有生成特征,也有创造性和开放性特征。解释学语义生成论的提出不仅在语言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也引起心理学对语言分析问题的关注。心理学主要关注语义知识的表征及应用于语言理解,进而了解人类语言理解的语义分析过程,并建构更符合人类心理活动规则的语义分析模型。在此理论背景下,Kintch提出命题网络模型,Aderson和Bower提出HAM模型。尽管如此,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并不能完全同步,二者时而相互迁就,时而相互拆台(Ahmad et al., 2017)。

诠释学和分析哲学并不对立,而是语言转向的互补形式。在分析哲学看来,关于语言和意义的恰当诠释问题,表现出从“逻辑原子主义”的句法-语义学模式转向彻底语用化的语言游戏模式(Habermas, 2003)。这促使处于危机中的心理学选择学科宽容和多元化视域。但是,解释学转向所奉行的“怎么都行”原则很容易导致心理学陷入相对主义、情境主义和主观主义。另外,在本体论解释学流行时,哈贝马斯提出和发展了批判解释学,批判解释学追问理解的前提和预设,具有建构主义色彩,这又契合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路径。在概念和逻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修辞和叙事等维度上,后现代心理学将差异化和宽容推向极致(Hong, Chao, Yang et al., 2010)。

#### 4 结构语言和西方心理学秩序进路的深入

语言转向的第三种方式是结构主义语言。结构主义语言对语言意义做二重划分,即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与历时,以及同一和差异。结构主义语言否定语言内容第一,语言形式靠后;重申语言形式的优先地位,独立构成一个自足系统(Frie, 1999)。由此,传统哲学中的主体地位在语言中消失,被语言的结构所取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给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范式期待,期望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使它们得到科学和严谨的表述(Hall, 2016)。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社会思潮,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论。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行为都受到一定规范系统所制约,这套系统在于语言规则。结构主义语言学受到心理学流派时期的思想影响,成型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使格式塔、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and 发生认识论得以发生和发展;拉康把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引入到精神分析学,重建古典精神分析理论,提出潜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潜意识冲动具有逻辑性的语言结构,使精神分析学从医学模式转变为语言伦理学模式。不容否认,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心理学的影响并未摆脱对科学逻辑的依赖。语言结构付诸心理之前,开始于数理结构,途径生物学和物理学。

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发展出特鲁茨科依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乌尔达尔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以及萨丕尔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结构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心理学新思潮。这一新思潮表现为以一些专题性的小型理论取代学派期的宏大叙事,例如人格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蓬勃发展。这些专题心理学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结构主义倾向的理论,例如人格结构理论、结构主义教学理论、结构和行动分歧、终生心理发展序列理论,等;还秉承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来加以考察。

结构主义语言推进心理学深入发展的关键在于其结构主义方法论。不论是主体外部的实践性活动,还是主体内部的概念性活动,都有两个显著特征:结构性和功能性(程利国, 2010)。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调节性要素。心理结构是整个机体实践性活动格式体系逐步内化的产物。结构主义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技术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心理学的结构主义既不能摆脱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又受制于心理学的具体方法技术。由此理解,心理学诸多具体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发端于结构主义方法论,方法创新又推进了心理学各主题理论和研究的发展。

20世纪30-50年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主体论哲学一统天下。基于欧洲形式主义和结构语言学纲要,结构主义提出以“结构分析”代替以“主体”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因此是反人道的。另外,结构主义把社会和历史分割开来,因此又是反历

史的。这是结构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公然违抗包括心理学在内各学科重视人文和历史维度的时代潮流。“五月风暴”前后,结构主义内部发生分化,一股解构的风尚兴起。对后构主义而言,“结构”不再是探究的目标,而是攻击的靶子;不再是需解开的秘密,而是需打碎的牢笼。心理学的后结构主义取向也悄然兴起。

## 5 小结

心理学脱离哲学,但终归不能回避哲学。事实上,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深入发展与主导型哲学思潮的变迁紧密相连。哲学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对心理学发展的意义就不言而喻。心理学哲学层面的困境和解释最少有三种重要表述:Buss 在《心理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西方心理学经历了四次革命;Kendler 在《进化还是革命》不赞成革命的提法,认为只是进化;Waston 则提出了 18 对以对立形式呈现的范畴(叶浩生,2007)。这三种表述各有侧重和合理处,但都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预设下提出的。认识论是否有权来审视和裁决这些问题,是否能以“第一原理”的姿态为心理世界安排等级和秩序?这是个问题。

显然,语言哲学不能接受这种裁决和秩序。首先,近代认识论哲学混淆了认识发生发展的心智过程与寻找知识确定性问题:前者是生理、心理学的问题,任务是说明个体何以成为知识的媒介物,成为认识发生的主要载体。后者则是个证明的问题,是依据科学的实证材料,证明确定知识何以可能。其次,近代认识论哲学没有解决好主客二分困境。知识何以可能的回答被宣告失败,使得(1)主体性被抛弃;(2)确定推论被否定;(3)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等科学哲学理论的盛行;(4)知识以认知者文化、社会历史、地域和民族为转移,知识附庸于意识形态(江天骥,1999)。紧随其后,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同时,西方心理学也进入危机话语时代,危机至今始终没有解除。

近代认识论为心理学走向独立和发展清扫过道路,也制造了新的障碍。语言转向担负起清理这些障碍,一方面,试图通过共同体的语言和行动使知识得以可能,恢复自然实在论和科学的地位;另一方面,拒斥近代以来的主客关系,将主体性消融在语言的界限中。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推动心理学关注语言建构和文本陈述,催生了新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然而,任何理论的效用都有其限度和边

界。不到 20 世纪结束,形形色色的“转向”竞相登场。语言转向或已成为过去,或已被类似“概念转向”和“表征转向”所取代,或者需要“再次回到语言转向”(胡欣诣,2012)。

西方哲学是西欧民族的意识形态。若希望打破西欧文明本身呈现的困境和危机,有必要不断修正自身的思考方式和理论框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理性取代上帝,成为一切主宰。人要认识世界必须通过理性,作为认识世界的语言理性被信任和推崇。维特根斯坦后,人要认识世界,首先要认识叙述理性的语言,认清人的语言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以语言来认识语言,是否注定这种认识终归就是“游戏”(覃安基,2011)。因此,既要肯定语言转向的积极意义,并以此指导西方心理学继续前行;也要认识到语言转向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封闭的逻辑圆圈。它不可能是“哲学的终结”,亦不可能护送心理学走向圆满。

## 参考文献

- 程利国. (1999). 论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2), 118-125.
- 邓安庆. (1990). 论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 学术论坛, 23(6), 19-23.
- 郭远兵, 漆昌柱, 郭小安. (2013). 论科学哲学问题及其对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2(10), 15-18.
- 郭远兵, 孙时进. (2017). 叙述社会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特异性——以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为契机.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8(5), 209-213.
- 海德格尔. (2006).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 王庆节译, p. 259). 北京: 生活·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 胡欣诣. (2012). “语言转向”已成过去了吗?——哈克与威廉姆森之争. 哲学分析, 3(5), 121-138.
- 江天骥. (1999). 知识、语言和行动——维特根斯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 哲学研究, 45(3), 21-30.
- 江怡. (2004). 当代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2(2), 5-12.
- J. R. 塞尔, 崔树义. (2001). 当代美国哲学. 世界哲学, 46(2), 3-10.
- R. 罗蒂, 陶黎铭. (1989). 后哲学文化. 世界哲学, 13(2), 56-58.
- 覃安基. (2011). 从语言到语言: 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游戏”——20 世纪语言学转向及其影响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 37(2), 117-120.
- 叶浩生. (2006). 心理学通史(pp. 7-11).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叶浩生. (2007).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理论心理学. *心理学报*, 39(1), 184 – 190.
- 周宁, 刘将. (2007). 论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44(6), 71 – 75.
- Ahmad, S., Li, K., Li, Y., et al. (2017). Formulation of cognitive skills: A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psychological and neurosciences studies.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gnitive Informatics & Cognitive Computing. IEEE*, 167 – 174.
- Frie, R. (1999). Psychoanalysi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35(4), 673 – 697.
- Habermas, J. (2003). *Truth and justification* (pp. 51 – 52). Cambridge, MA: MIT.
- Hall, S. (2016).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1), 57 – 72.
- Hanson, R. (1960). Patterns of discovery.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9(2), 247 – 252.
- Hong, Y. Y., Chao, M. M., Yang, Y. J., et al. (2010). Building and testing theories: Experiences from conducting social identity research; Building and testing theories: Experiences from conducting social identity research.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2(1), 22 – 36.
- Klippel, A., & Montello, R. (2007).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turn direction concep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atial Information Theory. Springer – Verlag*, 354 – 372.
- Pelletier, J., Elio, R., & Hanson, P. (2008). Is logic all in our heads? From Naturalism to Psychologism. *Studia Logica*, 88(1), 3 – 66.

##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es of Western Psychology

Guo Yuanbi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Linguistic turn is a product of self – criticism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Western psychology to get rid of the “Kantian – type problem.” With regard to the linguistic turn around philosophy,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internal logic of language turning and analyzed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themes, clues and paths in Western Psychology. Analytic philosophy, Hermeneutics, and Structuralism are three ways of language turning,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changes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es in Psychology, promoted the focus to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textual statements, and given birth to new theories and researches.

**Key words:** Western psychology; language turn; analytical philosophy; hermeneutics; structuralism